

任。时余主持私立今夕图书馆，与办事处相距密迩。一日先生以编辑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属为相助云。此事在渝时有所酝酿，资料缺乏，工作遂未开展。今将如何进行，颇费踌躇。婉谢再三，而先生坚持，不得已，勉以应命。再四思维，因念孤岛时期日本出版之各种图谱一类之书舶来甚夥，当时合众图书馆收有四十种亡友慈谿李君英年亦收有书画集二十种，余皆常寓目者遂以此为基础，又从番禺叶君恭綽借得十三种，徐先生亦有九种。凡上海所不易得而又重要者，如河口慧师所来西藏品图录、原田淑人的考古图编、大谷光瑞的西域考古图谱等十九种则请北平图书馆录目。如蒙厘清赏，既香港、陈氏旧藏十种等十七种，则请燕京大学图书馆录目。此外得张君政琅原稿一件，无錫華君绎之（翼）处及来复阁、富晋两书店各借得一种共得一百二十二种，时限较促，不克广事搜采矣。参考书既备，先生乃延聘吴静安、程天赋、谢辰生诸君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月而藏事。英、程二君因事先去，编录校订则以谢君之力为多。全书将成，贺君昌群来沪，书名凡

中国甲午以后 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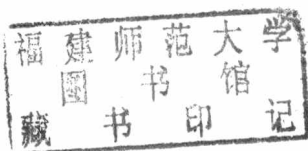
（卷一——卷三）

主編：徐森玉
編著：顧廷龍
吳靜安
謝辰生
程天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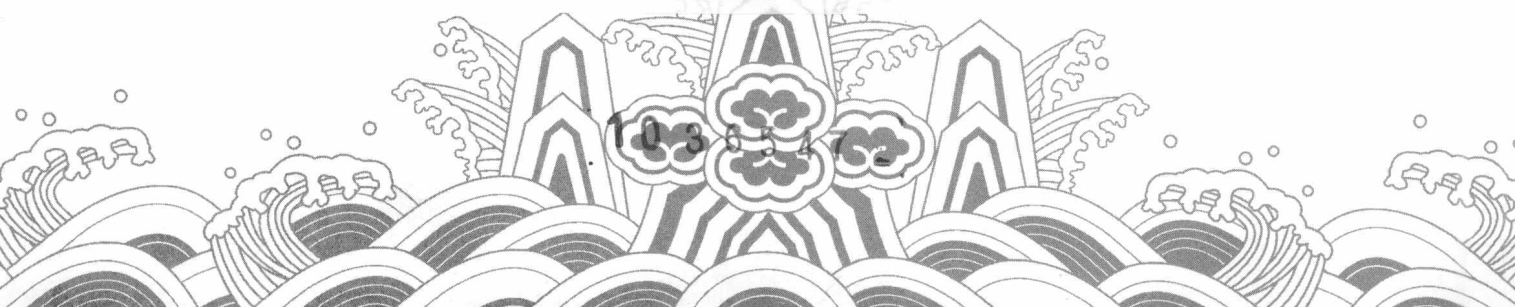
中国甲午以后 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

(卷一——卷三)

主編：徐森玉
編著：顧廷龍 謝辰生
吳靜安 程天賦



T1036547



出版說明

《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總一千四百四十四面，十六開，分為九卷，自一九四六年編成後，終於在六十六年後由中西書局首次正式出版。該目錄係一九四六年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京滬區辦事處組織編製，京滬區代表徐森玉主編，上海合眾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具體負責組織實施。顧廷龍先生在為一九八一年國家文物局內部油印本撰寫的《跋》中回憶說：『參考書既備，先生（徐森玉）乃延聘吳靜安、程天賦、謝辰生諸君草擬體例，從事編纂，九閱月而蕆事。吳、程二君因事先去，編錄校訂則以謝君之力為多。』因此，承擔主要編纂任務的是青年學者謝辰生。

這位青年學者是鄭振鐸先生新找到的助手，一九四九年進入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工作，歷任國家文物局業務秘書、副處長、研究室主任、副秘書長、顧問，現為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他參與了新中國文物考古和保護研究的全過程，堪稱最有發言權的歷史見證人。從一九五〇年政務院頒佈的最早的有關文物工作的重要法規《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跡、珍貴文物及稀有生物保護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保護古文物遺址的指示》等首批文物法令，一九五六年《關於在農民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一九六一年國務院頒佈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

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到一九八二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等，都是他執筆起草的。

顧廷龍、賀昌群先生等多方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館所藏中國文物圖譜、目錄，以及張政烺等中國學者的研究著作一百二十二種，認真考辨其中所列中國甲骨、石器、銅器、刻石、陶瓷、古玉、絲繡、書畫、寫經、拓本、雜項、古籍等類中國文物，編成《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收錄甲午以後因各種原因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件，大部分器物標出了高度、重量、口徑尺寸、藏處以及所依據圖譜的書名簡稱、頁碼，並將樂浪郡王墓、樂浪王光墓、樂浪土城出土之文物，皆屬中國漢代重要遺物凡存於朝鮮總督府博物館者，列為附錄一；又將日軍侵華期間，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考古學研究室在大同、平城，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在安陽、商丘，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定襄、太原、五臺山、渾源，日本駐太原特務機關文化室在五臺山，興亞學院北支那佛教史跡調查團在太原西北蒙山，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在河南平漢沿綫等地的三十四次調查、發掘，『不能詳知其所得古物及後來收藏何處』者列為一表，編為附錄二，以資調查。隨後列出編纂凡例，說明編纂原則和體例設定，再附上《目錄》編纂所依據的一百二十二種引用書目之書名、編者、文物收藏者、圖譜出版者、印製時間等詳細資訊，然後列出與這些文物相關聯的五百九十四個日本人物、五十九家公私博物館等機構，注明所在卷、頁，名之為目次，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人名、機構名稱索引，讀者查找十分方便。

編纂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錄所依據的一百二十二種參考書，當下研究者、讀者一般不易見到，特為羅列，以期能引起專家和各界讀者的關注。如：《文部省認定重要美術品目錄》（章華社編輯，日本昭和十二年印行一冊）、《東京帝室博物館美術工藝部第一區金屬品目錄》（日本大正七年十一月排印本一冊）、《東京帝室博物館美術工藝部第五區玉石品目錄》（日本大正九年十二月排印本一

冊)、《東京帝室博物館美術工藝部第六區甲角品目錄》(日本大正十年排印本一冊)、《帝室博物館年報》(自大正十五年一月至昭和十二年一冊)、《帝室博物館鑒賞錄》(東京帝室博物館編,明治三十九年印本一冊)、《帝國博物館藏周漢遺寶》(原田淑人等編,昭和七年印本一冊)、《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原田尾山著,昭和十三年東京博文堂書店排印本一冊)、《澄懷堂書畫總目》(山本悌二郎藏,昭和六年文求堂鉛印本一冊)、《支那古美術聚英》(大阪市立美術館編,昭和十四年便利堂景印本一冊)、《關東現存宋元版書目》(長澤規矩也編,昭和十三年排印本一冊)、《河口慧海師將來西藏品圖錄》(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編,明治三十七年印行一冊)、《考古圖編》(原田淑人編,昭和二年東京美術工藝社印本第八輯一函)、《西域考古圖譜》(二卷,大谷光瑞藏,香川默識編輯,大正四年東京國華社印行)、《泉屋清賞》(住友吉左衛門藏,濱田耕作編,大正八年影印本七冊,續編二冊)、《甌香譜》(橫河民輔藏,青山二郎編,昭和六年東京工政會出版,圖六十幅目錄一冊)、《古本三國志》(昭和六年兵庫縣武居綾景印一卷)、《恭仁山莊善本書影》(內藤虎次郎藏,大阪府立圖書館編,昭和十年京都小林寫真製版所出版一冊)、《近畿善本書錄》(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編,昭和八年景印本)、《德富氏成實堂善本書目》(日本峰先生古稀祝賀紀念刊行會編,昭和七年排印本一冊)、《八年來日人在華諸省所作考古工作紀略》(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大公報·圖書週刊》第二三期)等等。

《目錄》於一九四六年編成後,錄存九份,除送交有關部門外,僅存兩份存放在上海合眾圖書館。建國後顧廷龍先生把其中一份送交上海圖書館保存。謝辰生先生在為本書正式出版撰寫的《前言》中回憶說:『一九八一年初我收到顧廷龍先生來函稱,他手上僅存的一份目錄因復寫字跡日益退落,很難保存,要我向文物局反映,可否油印若干份以利保存。當時的局長任質斌同志十分重視,立刻批准油印一百份,並安排研究室于秀華同志負責具體操辦,經過兩年多時間才全部完成,共印一百』

部，由文物局分發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博物館以及設有文博專業的大學。』謝辰生先生還特請啟功先生為之題簽。二〇一一年秋，中西書局徐忠良同志在追尋王世襄先生一九四七年從日本追回一百零六箱珍貴宋元版古籍的相關線索過程中，獲知謝辰生先生曾在一九四六年編纂《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而且六十六年來從未正式出版的信息，即商請北京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楊璐幫助，登門拜訪謝辰生先生，榮幸地獲得原樣影印出版的獨家許可，謝老並慨允為《目錄》的公開出版撰寫《前言》。

不承想，在向多家國內博物館、圖書館尋找一九八一年油印本時，竟然遍覓不得，只得轉回謝老府上，請求謝老在家中翻查尋找，三個月後謝老才從國家文物局原來負責油印的于秀華同志處找到了她僅存的一部。隨即商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用高倍進口掃描儀進行掃描複製。不久，遇到一位剛從日本講學歸來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他非常贊成中西書局的出版方案，認為從甲午到抗戰勝利，正是中國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為嚴重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時期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大都是通過劫掠、搶奪等非法、非正常途徑；其次，這些文物等級很高，均為高品級的珍稀文物；其三，在即將迎來甲午海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之際，把這樣一部依據清晰、考訂詳盡、器物確鑿的流散文物目錄，在延宕六十六年之後公開影印出版，非常重要，意義非凡，相信歷史、文物、收藏界和媒體一定會高度關注。可他告訴我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大書庫裏就擺放着這部中國國家文物局的油印版《目錄》，供人翻閱，不禁令人五味雜陳，扼腕唏噓！不過，教授親歷親見的這個事實，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中西書局決心仿真影印、公開出版這部文物目錄，的確是非常必要的。

顧廷龍先生的《跋》、謝辰生先生的《前言》分別對他們當年編纂《目錄》的緣起、過程作了介紹，但二位前輩太謙遜了，對我們後輩人來說，他們的介紹實在是過於簡略了。所以，我們在按照原樣影印出版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錄的同時，還必須綜合多方面的資訊和歷史資料，再現前輩學者艱苦

編纂的歷史背景，還原歷史過程，銘記歷史教訓，感恩前輩的艱苦奉獻。

一九四五年四月，抗戰勝利前四個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十二月，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指令，『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更名為『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以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為主任，著名學者考試院考選委員陳訓慈、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李濟、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梁思成為副主任，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外交部長王世傑，軍政部次長兼兵工署署長俞大維，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主任張道藩，教育部國民司司長顧樹森，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國史館館長張繼，北平研究院院長李書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和著名學者沈兼士、劉敦楨、張鳳舉、賀昌群、張政烺等二十六人為委員，下設京滬、平津、粵港、武漢、東北五個區辦事處。徐森玉為京滬區代表，余紹宋、黃增樾、江彤侯、程復生為副代表，金研僧為助理代表，顧廷龍為辦事員；沈兼士為平津區代表，唐蘭為副代表，王世襄為助理代表。

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成立後，在陳訓慈先生的實際主持下，各地代表和工作人員滿懷愛國熱情，克服重重困難，認真清查文物損失情況。但要詳盡準確統計日寇破壞、掠奪文物的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經過非常艱苦的努力，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統計得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間中國各地被日軍劫掠和毀壞的歷史文化古跡七百四十一處，書畫類一萬五千多件，古器物類一萬六千多件，碑帖類九千三百多件，珍稀書籍類三百萬冊，雜件類六十多萬件，並將此統計結果上報教育部和國民政府。

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同時還承擔追回被劫掠文物以及接收敵偽圖書文物的任務。比如徐森玉先生先後接收上海敵偽圖書一百二十四箱五萬一千六百六十六冊、南京敵偽圖書六十九箱三萬四千五百二十五冊，運送重慶羅斯福圖書館收藏，其中珍本、善本圖書六百零五種九千八百七十三冊。比如王世襄先生，在被馬衡和梁思成先生推薦為平津區助理代表後，因英文底子好，還承擔了

《戰時文物損失報告表》的中英文校對工作。他在北平、天津先後沒收了德國人楊寧史所藏青銅器，收購了收藏家郭葆昌所藏瓷器，追回美軍少尉非法接收的日本人瓷器，收購長春存素堂的宋至清代絲繡，接收溥儀留存天津張園的珍貴文物，收回海關移交的德孚洋行一批珍貴文物等。他在《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一文中說：『自西元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後，奔走調查，收回被劫奪重要文物、善本圖書二三千件，其中不乏國之重寶，由故宮博物院等機構接受保管，當屬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一九四六年底，因英文好，又精通文物，王先生又加入中國政府代表團第四組，赴日進行戰犯審判、戰爭索賠等談判，主要負責調查、交涉、追還被日寇掠奪的中國文物事宜。一九四七年，歷經千辛萬苦，王世襄先生從日本追回了被劫奪的原中央圖書館寄存在香港馮平山圖書館的珍善本古籍一百零六箱，其中有大量宋元版善本，並隻身將其運回上海，經謝辰生先生等接收後由鄭振鐸先生轉給設在南京的中央圖書館。這批珍善本古籍是抗戰爆發後，為搶救淪陷區一些著名藏書家舊藏散失在市場上的珍貴善本古籍，當時留在上海的鄭振鐸、張菊生、張壽鏞、何炳松、張鳳舉等聯名電請重慶國民政府進行搶救收購。不久即收到陳立夫、朱家驊復電同意，並決定動用中英庚款原定用於修建中央圖書館的專款，作為購書經費，當即由他們五人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專門辦理此事。當時還決定所購善本古籍，將陸續經由香港轉運重慶保存，但是除第一批有八十余種宋元善本由徐森玉帶走經由香港送往重慶外，其餘三千多種運抵香港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這批珍善本古籍落入日軍之手，被劫往東京。王世襄先生從日本追回的這批珍貴古籍，一九四九年在國民黨潰敗時被帶往臺灣，是現在臺灣『中央圖書館』珍善本古籍的主體，而剩餘部分則留在了現在的南京圖書館。

當王世襄先生在日本奮力追索被劫中國文物的時候，徐森玉、顧廷龍、謝辰生先生等則在上海傾注巨大心力，歷時九個月，編纂《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這個編纂工作既是清理戰

時文物損失調查的往前延伸，也是為中國政府向日本開展戰爭賠償作準備的一個組成部分。正如顧廷龍先生在《跋》中指出的，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曾請外交部向遠東顧問委員會及盟軍駐日總部提出《追償我國文物意見書》一種，其中主要要求為：自甲午以來，凡為日本掠奪或未經我政府許可擅自發掘之一切文物，均須由日本交還。該會深感在甲午以後，我國文物為日本巧取掠奪者，為數甚夥。此次辦理賠償，自亦應不以民國二十六年後之戰時損失為限。而在此期間，凡為日本破壞或因日本軍事行動損失之文物，則必須責令以同類或同等價值之實物賠償，故除編製《戰時文物損失目錄》外，復編《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以為交涉之依據』。因此這份《目錄》的編製在當時除了外交上的價值之外，在學術和民族情感上具有更為重要的價值。

關於這部《目錄》的價值，謝辰生先生在《前言》中引用顧廷龍先生《跋》語說：『此目雖較簡略，收藏情況亦多有變化，但以資料索引視之，未嘗不足以供文物工作者之一覽。』雖然限於當時的歷史條件，《目錄》只有目，沒有圖，其著錄的內容也的確較為簡略，而且自一九四六年以來，世事變遷，日本歷經美軍轟炸、地震損害、經濟危機、戰後重建，部分文物的收藏情況很可能已經發生了變化，但這是自唐宋以來由中國文物學者編著而成的第一份流散日本而且確鑿依據、確切下落的中國文物目錄，雖然只有區區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件，尚未記錄的文物還浩如煙海，但決不可等閒視之。作為出版人，我們深切地期望新一代中國學者能追隨前輩大師的足跡，繼續編著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這樣的流散文物目錄，當然最好是配上清晰、準確的文物照片的圖錄。我們要誠摯感謝徐森玉、顧廷龍、謝辰生等前輩學人為民族為國家留下的這份中華民族永遠不應忘記、不可忘卻的慘痛記憶。他們留下的這份確切、確實、確鑿的海外流散文物目錄，為學術界、收藏界研究、瞭解這些珍稀文物提供了非常堅實的研究資料，同時也完全可以看作是學術界、出版界追尋海外流散文物下落的一次寶貴努力。因此，這部珍貴《目錄》於編纂六十六年後正式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

值、學術價值和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在完成掃描核對全書校樣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卷五頁一六一、一六二頁碼漏編，而頁一六三、一六四重複，經仔細核實，內容完全不同，當屬蠟版刻寫時的筆誤，已經予以改正。此外，卷二缺漏頁六九、七〇，卷六缺漏頁一五一、一五二，應該是油印本在裝訂時發生了遺漏。可惜當我們回頭去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查找油印版《目錄》核實時，竟然找不到了。很高興的是又意外地得到吉林大學圖書館有藏的資訊，立即商請吉林文史出版社徐潛社長幫助找吉林大學圖書館館長查核，但也遍查不得，令人遺憾。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在吉林大學圖書館或者別的地方找到另外一部油印本，補齊這缺漏的四頁。

值此《目錄》正式出版之際，謹向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和徐森玉、顧廷龍、謝辰生等前輩與國家文物局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為《目錄》出版提供無私幫助的北京古籍出版社總編輯楊璐、吉林文史出版社社長徐潛、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兼中國古籍保護中心副主任張志清、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常務副館長陳紅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教授劉玉才、顧歆藝表示深切謝意。

中西書局

二〇一二年七月

前 言

前言

《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是在一九四一年由教育部戰時清理文物損失委員會京滬區辦事處組織編制的，主編是委員兼辦事處主任陳森玉，具體組織實施負責人是在上海私立合众圖書館長顧廷龍，參加編制工作的有吳靜安、程天賦、謝辰生，辦公地點就在上海古拔路合众圖書館。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當時的中國政府決定要求日本送甲午以後他們巧取豪奪中國所有的文物歸還中國，編制此目就是為向日本

追索進行交涉的依據。關於此事的緣起和經過，一九八一年顧廷旭先生為國家文物局決定油印此目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跋，作了詳細的介紹。在此我不再贅述。

我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机会參加了目錄的編制工作的。一九四六年初我的伯父在河南安陽病故。我大哥謝國楨（剛主）從北平經周揚同志聯系通過解放區到安陽奔喪，中途在北方大學見劉范文瀾同志。當時的北方大學很需要圖書資料，范老特委託剛主到上海買一批圖書。因此，剛主在處理完喪事之後立即趕赴上海。

並且帶我一起去上海幫助他完成購書任務。到上海第三天，徐森老請我們吃飯，並約請了鄭振鐸先生作陪，席間鄭先生說他近來工作十分繁重，很需要一個人幫他處理一些不必要他親自动手的了。當時徐森老就把我推薦給他，鄭先生欣然同意，並要我第二天就到他家去開始工作。但是徐森老又提出在一段時間里要我還參加由他主持的《中國甲午以後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的編制工作。經商定每天上午分別到鄭家和在圖書館上班。因此直到一九四六年底目錄編制完成後，我才到鄭家全職上班。之後至於目錄的處理情況就一無

所知了。二十四年后一九二年初我收到顧廷龍先生來函稱他手上僅存的一份目錄因重寫字迹日益退落很難保存。要我向文物局反映可否油印若干份以利保存。當時的局長侯廣武同志十分重視立刻批准油印一百份並安排研究室于秀華同志負責具體操辦。經過兩年多的時間才全部完成。共印一百部由文物局分發各省、市自治區圖書館、博物館以及設有文物專業的大學。每份又是三十年過去。二〇二一年秋北京古籍出版社總編楊路同志偕同上海中西書局總編徐忠良同志突然來訪據稱王世襄同志曾告楊路同志他在抗戰勝利後從日本追討回一批善本書於一九

四七年這回上海時是交由我接收的。並且還知道我曾參加過
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之的編輯工作，而多年來迄未出版。特來了解情況，並
表示有意出版這個目錄。這使我既意外又驚喜。經協商決定由上
海中書局同我保存的一部油印本以彩色影印出版，並由我寫个前言介紹
過去的情況。在此目即將出版之際，我還想再重複引用顧廷龍先生的一
段跋語：「此目雖較簡畧，收正情況亦多變化，但以資料索引視之
未嘗不足以供文物工作者之一覽。」

二〇一二年三月

謝辰生

時年
九十五



目 錄

出版說明	前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附錄一	附錄二	引用書目	目次	跋
一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七	九	一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	八	四	一	一	一	七	九	〇	三	三	三	四
一	一	一	三	五	七	五	一	五	七	三	一	九	五	九	九